

中山大學藝術史研究中心編  
《藝術史研究》  
The Study of Art History  
第十四輯  
Volume XIV

# 空間與心理：澳門聖保祿教堂再研究

董少新

# 空間與心理：澳門聖保祿教堂再研究

董少新

## 一、前 言

長期傳教於越南的法國耶穌會士 Alexander de Rhodes (1591—1660 年) 曾造訪澳門，於 1623 年寫道：聖保祿 “教堂如此美麗，我所見過的教堂，包括義大利的眾多美麗的教堂，除了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之外，都無法與其相比。其前壁尤為絕妙，內部寬敞，建築風格別致。教堂頂部和底部鑲金，裝飾絕美繪畫”<sup>[1]</sup>。

英國旅行家 Peter Mundy (1600—1667 年) 在其環球旅行中途徑澳門 (1637 年)，他寫道：“附屬於學院（被稱為聖保祿學院）的教堂，其穹頂是迄今為止我所見過的最美的建築，是中國工匠的傑作。木質雕刻並鍍金，漆以華美色彩，如朱紅和靛藍。分多個方格，銜接處飾以帶葉的多瓣大玫瑰，至末端縮為球形紋飾；花紋寬約一碼，從球形紋垂直至屋頂亦約一碼。該教堂還有一個美麗的新前壁，面朝一個寬闊的大階梯。前壁和階梯以石板砌成。”<sup>[2]</sup>

澳門聖保祿學院 (Colégio de S. Paulo) 建成於 1594 年，是遠東第一所西式高等教育機構<sup>[3]</sup>。聖保祿 (約 5—約 67) 是耶穌基督十二門徒之一，曾三次前往遠方傳教。耶穌會以此命名其學院，意在繼承聖保祿之傳教事業。該會在果阿所建的學院亦以聖保祿命名。澳門聖保祿學院建築起初多用木料，1601 年的一場大火幾乎使全部建築化為灰燼。1602 年學院及其所屬教堂重建，其中教堂前壁直到 1640 年左右纔全部完工。重建後的學院和教堂規模更為宏大壯麗，給包括 Rhodes 和 Mundy 在內的過往商旅留下了深刻印象。1835



圖1 聖保祿教堂前壁 作者攝於2011年10月31日，本文所用照片，除注明外，均為作者拍攝

年）神父撰寫了兩篇論文，討論聖保祿教堂的歷史<sup>[5]</sup>。90年代，澳門政府組織學界對學院及教堂遺址進行考古發掘，以期對其建築歷史深入瞭解，呈現其火災前的結構圖，考古成果已由澳門文化局用葡、英、中三種文字出版<sup>[6]</sup>。1997年，葡國學者 Gonçalo Couceiro 出版專著，對澳門聖保祿教堂的歷史與藝術做了專門研究<sup>[7]</sup>。本世紀以來，尤其是2005年澳門歷史城區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以後，聖保祿教堂特別是其保留下來的前壁，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代表性的成果包括柬埔寨華人學者邢榮發《明清澳門城市建築研究》，其中第三章專門探討聖保祿學院建築史及前壁浮雕藝術<sup>[8]</sup>；西班牙藝術史家胡紀倫（Cesar Guillen Nuez）的專書《澳門聖保祿教堂》，從歐洲藝術史角度對該教堂的建築藝術及其歷史做了研究<sup>[9]</sup>；瑞士學者 Louis Antonin Berchier 經過長期研究，對教堂前壁上每一幅浮雕圖像做了解釋<sup>[10]</sup>。

以上研究主要利用葡萄牙文資料、圖像資料和考古發掘，大致呈現出澳門聖保祿教堂的歷史，重繪出該教堂的建築結構圖，並且對現存教堂前壁所包含的所有藝術元素都給出了相應的闡釋。但在某些問題上仍存爭議，例如，該教堂的設計者，許多學者認為是義大利耶穌會士斯皮諾拉（Carlos Spinola, 1564—1622年），但有學者提出質疑，認為1602年初即離開澳門赴日本傳教的斯皮諾拉不可能是聖保祿教堂的設計者；關於教堂的建築風

年這一建築羣再遭毀滅性的火災，僅教堂前壁得以保留下來，至今矗立於原址（圖1），成為澳門的象徵，每日遊客如織。

早在19世紀末，澳門葡萄牙學者就開始研究聖保祿教堂<sup>[11]</sup>，20世紀70年代，葡國著名歷史學家文德泉（Manuel Teixeira, 1912—2003

格，有學者認為是巴羅克風格，但也有學者認為其尚未進入巴羅克時代，而屬於風格主義（Mannerism）晚期。然而學界基本認同該教堂體現出與天主教托蘭特會議（Council of Trent, 1545—1563年）精神相符合的耶穌會自己的風格（*modo nostro*）。

從已發表的成果來看，西方學者貢獻突出，而中國學界較少參與其中。但西方學者的研究一個嚴重缺陷是對中文史料的長期忽視，致使我們無法瞭解這座建於中國領土上的大型西方建築在國人心中的印象如何。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不會糾纏於風格的判斷，亦不會重複詮釋圖像的宗教內涵，而著重討論三個問題：一是利用澳門地志圖等材料考察聖保祿教堂的空間位置；二是考察教堂所包含的東方元素；三是使用中文資料考察國人心目中的聖保祿教堂，並從這三個側面入手探討文化交錯現象在一座建築上的體現，以及這座異域風格建築對本國人的視覺和心理影響。

## 二、澳門聖保祿教堂的空間位置

澳門是一個狹小的地理空間，卻聯繫著東西方廣闊的區域，吸引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們為不同的目的來到這裏。一些旅行家、地方官員、傳教士等，將澳門的整體形象繪製成地志圖。保存至今的澳門早期地志圖有數十幅，是研究澳門歷史的一類特別資料<sup>[12]</sup>。本節即選擇各個時代具有代表性的澳門地志圖，並參考其他文獻、圖像材料，分析聖保祿教堂的宏觀空間位置和在澳門本地的空間位置。至於教堂的內部空間，容日後另文探討。

澳門位於珠江入海口西側，是一個東北至西南走向呈蓮花狀的小半島，總面積不足3.5平方公里。北面以一條狹長的通道與大陸連接，時人稱之為蓮花莖。東北部和南部有兩座山，中間地勢較平坦。東面朝海，西面朝西江入海口，分別有南灣和內港可以泊船（圖2）。

澳門原為小漁村，從1550年代起，葡萄牙商人獲得中國官方許可，得以居留貿易，澳門從此迅速崛起，成為東西方貿易的重要口岸。此外，1555年已有耶穌會士至澳門，十年後，耶穌會士在澳門建立住院和教堂。澳門也很快成為天主教在遠東地區發展的橋頭堡。

從宏觀角度看，澳門是天主教在東方勢力擴張鏈條中的關鍵一環。東北方是傳教事業迅速發展的日本，北方是亟待開闢傳教區的人口大國中國，東南方有西班牙佔領的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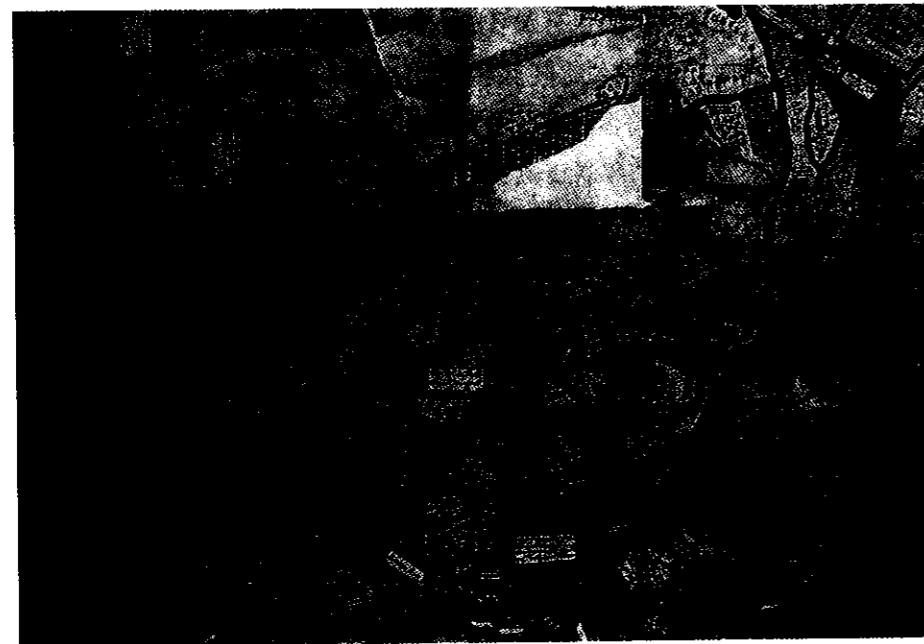


圖 2 西江、珠江入海口圖 廣州省城、香山縣城和澳門均清晰可見。見 Jorge Pinto de Azevedo, *Aduertencias ha Coroa del Rey Dom João4º* (Macau, 1646) [Biblioteca da Ajuda (阿儒達圖書館), Lisboa]

拉，西南方則有東南亞傳教基地馬六甲，以及天主教東方最高權力機構所在地果阿。這一天主教傳播網路與西方各國在亞洲建立起來的商業網絡幾乎完全重疊，而為了獲得傳教所需資金，教會亦參與利潤豐厚的轉口貿易之中。

主要得益於經營廣州長崎之間的貿易，16世紀最後25年成為澳門的黃金時代。1576年，教宗格里高利三世宣佈成立澳門主教區，管轄中國、日本、朝鮮、安南，以及這一區域內的島嶼，就地理範圍而言，澳門教區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主教區。到1578年，澳門已經有各類教堂五座：主教堂（Matriz）、聖安東尼教堂（S. António）、聖老楞佐教堂（S. Lourenço）、仁慈堂所屬望德聖母堂（N. Sra. Da Visitação da S. Casa da Misericórdia）和耶穌會堂（Igreja dos Jesuítas）。但這些教堂十分簡陋，遠非現在教堂之壯觀。主教堂仍是木製結構，祇有兩間。耶穌會堂起初是用桔杆建成的茅屋，曾被中國人放火燒毀，後又用木頭及瓦搭建。

豐厚的貿易利潤使澳門人口激增，至1580年代達兩萬人，其中包括中國人、葡國人、印度人、馬來人、穆斯林、日本人等，而教徒人數達五、六千人。1583年澳門成立議事

會，1586年葡印總督授予澳門與埃武拉（Évora）同等的城市地位，並被稱為“上帝盛名之城”（Cidade do Nome de Deus do Porto de Macao da China）。到1589年澳門的教堂總數為8個，除上述5個外，又建有聖方濟各（S. Francisco）、聖多明我（S. Domingos）和聖奧斯定（Sto. Agostinho）三座教堂。

澳門是馬六甲以東區域的傳教樞紐，不僅為傳教提供資金，更為教區培訓傳教士。早在1560年代，澳門耶穌會便開始開辦初級學校，至1594年建成高等教育機構聖保祿學院及其所屬教堂。不僅本地學生需在這裏接受語言乃至神學訓練，新來之歐洲傳教士亦需在此進一步學習，熟悉東方語言和文化，然後方可前往各地傳教。此外，日本歷次教難被驅逐的教徒，有很多逃亡至澳門<sup>[12]</sup>，居住於聖保祿學院，一部分日本教徒還參與了聖保祿教堂與學院的重建<sup>[13]</sup>（圖3）。

在17世紀澳門建築中，聖保祿學院及其教堂是規模最大的西式建築羣。1602年重建



圖 3 1598 年以前澳門圖 見 Theodor De Bry (ed.), *Petits Voyages* (Frankfurt – am – Main, 1606 – 1607)。這是迄今所見第一幅在歐洲出版的澳門地志畫。可見 1601 年火災前的聖保祿學院及其教堂



圖 4 聖保祿教堂前舉行葬禮儀式 Baron Von Reichenau 繪，約 1637 年。引自 *A Museum in a Historic Site: The Monte Fortress of St. Paul*, p. 88

戲劇表演。1637 年 Peter Mundy 在澳門時，曾應教士的邀請前往教堂觀看中國、葡萄牙和荷蘭兒童舞蹈表演，並記錄下當時的情景<sup>[15]</sup>（圖 4）。

聖保祿學院及其教堂建於澳門北面炮臺山西側的山坡上，地處整個澳門半島的中心。北面有城牆包圍，這道城牆是 1568 年以後開始陸續修建的，據說是澳門中葡居民因擔心海盜攻擊而要求耶穌會修建的，而主建築師是一位叫做 Siu-San 的中國人<sup>[16]</sup>。教堂與學院的東面山頂上，是澳門最重要的軍事要塞——聖保祿炮臺。1610 年代，澳門先後遭到 4 次荷蘭艦隊的攻擊（1601、1603、1604、1607 年），儘管荷蘭人沒能從葡萄牙人手中奪得這個遠東地區最重要的商業據點，但其對澳門的威脅持續了數十年。在這一背景下，澳門著手建設防禦工事，於 1612 年開始修建聖保祿炮臺，至 1626 年完工。在 1622 年抵抗荷蘭艦隊的攻擊中，尚未竣工的大炮臺發揮了重要作用。義大利耶穌會士羅雅谷（Jacques Rho, 1593—1638 年）所發射的炮彈擊中了荷蘭艦隊的彈藥庫，導致其潰散（圖 5、圖 6、圖 7）。

教堂北面城牆外，有一座麻風病院及其附屬的望德聖母小堂，始建於 1568 年，專門收容中國麻風病患者，再加上南面不遠處的仁慈堂和東面的貧民醫院，以及聖保祿學院的學房與診所，構成了服務於澳門中外居民的宗教醫療慈善體系。聖保祿學院的教士們定期

的聖保祿教堂寬 23 米多，長 36 米有餘，主體高 17 米有餘，前壁高 23 米有餘<sup>[14]</sup>。再加上右側緊鄰的聖保祿學院，更顯宏偉壯觀。站在停泊於南灣和內港的船隻甲板上均可望見高聳的教堂，從教堂鐘樓傳出的鐘聲響徹全澳。這是馬六甲以東地區規模最大的西式建築羣，不僅體現了澳門貿易的興盛，也顯示出耶穌會推動遠東傳教的信心。

聖保祿教堂前有一個小廣場，是澳門市民的休閒娛樂中心，經常會舉行宗教遊行，吸引著大批男女老幼前來觀看。而教堂裏則會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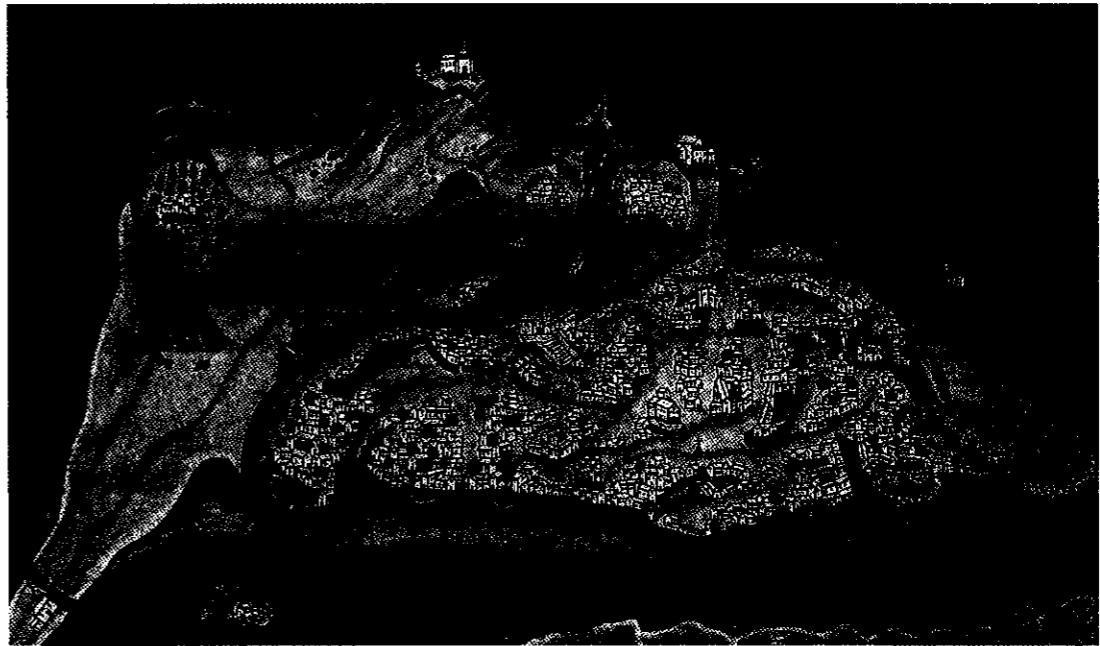


圖 5 澳門圖，Barreto de Resende 繪，見 *António Bocarro, Livro das Fortalezas da Índia Oriental (ms. Goa, 1635)* [Biblioteca Pública de Évora (埃武拉公共圖書館)]。聖保祿教堂、炮臺、城牆、主教座堂等建築清晰可見。此圖的繪製樣式影響深遠，直到十九世紀以前，無論是歐洲人還是中國人所繪的澳門地志圖，大多採取這一樣式。例如下面這兩張清代的澳門圖



圖 6 澳門圖 約 1678 年（？），貼有 9 張滿文標簽（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圖 7 張寶《澳門遠島》（1818 年），見氏著《泛槎圖》，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 年



圖 8 十七世紀的澳門麻風病院與望德聖母堂 山上是東望洋教堂。José Manuel de Sousa e Faro Nobre Carvalho, *IV Centenário da Santa Casa da Misericórdia de Macau, 1569 – 1969*, Macau: Impressa Nacional, 1969



圖 9 十八世紀的澳門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頁 108—109

重吸收華人教徒等，使其影響面覆蓋整個澳門乃至番禺、香山、順德、佛山、東莞等地，彰顯出耶穌會在澳門教會中的主導地位。在兩個多世紀中，聖保祿教堂及週圍西式建築羣為澳門中外居民提供了信仰空間、慈善空間、防禦空間、娛樂空間、社交空間，是澳門宗教、文化、社會和軍事的中心。

1835 年一場大火焚毀了聖保祿教堂和學院，僅剩下教堂前壁。這場火災似乎是一個啟

走訪街巷和醫院，為患者提供精神上和醫療方面的幫助。這不僅有利於吸引人們領洗入教，而且有助於華洋雜處的澳門社會安定<sup>[17]</sup>（圖 8）。

聖保祿教堂西邊不遠處，是阿巴羅修道院與教堂（Igreja e Seminário de Nossa Senhora do Amparo），始建於 1633 年，康熙年間擴建（圖 9），專為華人而設，吸引內地臨近各縣教徒前來禮拜，故被稱為唐人廟，又名進教寺。乾隆十一年（1746）福建發生教案，時任澳門同知的張汝霖密揭臺院，上《請封唐人廟奏記》，唐人廟遂遭查封<sup>[18]</sup>。

與澳門其他西洋教堂（如方濟各會教堂、多明我會教堂和奧斯定會教堂）相比，耶穌會聖保祿教堂不僅規模宏大，且位於高處核心區域，給澳門所有中外居民及過往商旅以強烈的視覺衝擊；其又通過開辦教育、戲劇表演與宗教遊行、醫療和慈善事業、參與軍事防禦、注

至今仍屹立於原址的聖保祿教堂前壁，因有大量雕刻而顯得格外華麗，是一件藝術珍品。已有學者找出了前壁大多數裝飾元素的西方淵源（圖 12）<sup>[19]</sup>，因此不能說聖保祿教堂的建築是融合了東西方藝術風格<sup>[20]</sup>，但是從前壁裝飾細節看，的確包含著一些東方元素。而因為這些東方元素，前壁裝飾藝術更顯特別。



圖 10 火災前的聖保祿教堂 錢納利（George Chinnery）繪，1835 年以前 *A Museum in a Historic Site: The Monte Fortress of St. Paul*, p.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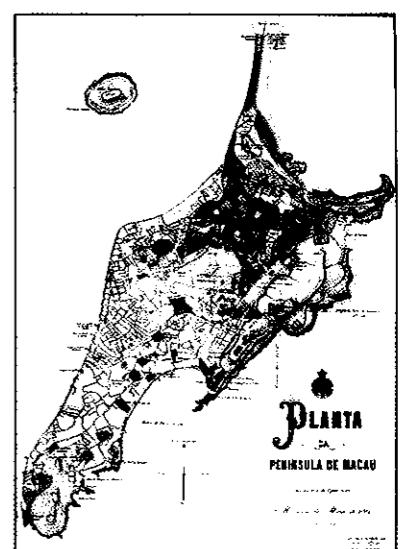


圖 11 澳門圖（1889 年）聖保祿教堂和學院位置已成廢墟

示，預示著整個中歐關係與文化交流的轉變：七年後中英《南京條約》簽署，英國人割佔香港島，那裏有著適合停泊火輪船的深水港。隨英國商人和艦隊一同前來的是英美新教傳教士，他們迅速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角。與迅速崛起的香港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失去中外貿易獨特地位的澳門走向沒落，需要靠博彩這一有違天主教戒律的行業來維持其繼續存在（圖 10、圖 11）。

### 三、聖保祿教堂前壁的東方元素

教堂前壁分為五層，自上而下分別象徵天界、救世主（水晶天）、上天和世俗世界與教會的聯繫（星宿天/穹窿天）、耶穌會的榮耀、人間教堂入口<sup>[21]</sup>。整個前壁共有雕塑圖



圖 12 教堂前壁多數浮雕圖案  
均可在此圖中找到



圖 13 前壁第三層所刻的四列漢字

像 50 餘組，前人已對每組圖像做了研究和闡釋，本節僅討論其中包含東方藝術元素的圖像，分析其宗教內涵之外，探討其在多大程度上說明天主教的本土化。

### 1. 漢字

前壁中最具東方色彩的內容首推第三層所刻的四列漢字。第一列位於左面第二格魔鬼圖像右側，陽刻：“鬼是誘人爲惡”。第二列位於右面第二格骷髏圖像左側，陽刻：“念死者無爲罪”。第三、四列位於右面第三格七首怪獸和聖母雕像右上方，陰刻：“聖母踏龍頭”。漢字均爲楷書，第一、二列爲同一人所書，而第三、四列或爲另人所寫。字跡工整，筆劃飽滿圓潤，當是中國文人之作。第一、二列漢字位置對稱，分列於正中聖母銅像兩側，又同爲六字，易使人聯想到中國楹聯，但文字毫不對仗，並非楹聯（圖 13）。

這些文字均爲天主教義的漢譯。“鬼是誘人爲惡”意即魔鬼誘惑做邪惡的事情，一旁被箭射中倒地的魔鬼浮雕長著女性身體，代表邪惡的欲望。“念死者無爲罪”意即牢記死亡隨時來臨，切莫作惡，一旁同樣被箭射中倒地的骷髏以及大鐮刀象徵死亡。“聖母踏龍頭”象徵貞潔戰勝魔鬼的力量。教堂建築以中文刻上教義內容，此爲明清以來建於中國的天主堂中僅有的例子。

### 2. 龍

無論形象還是象徵意義，聖母所踏之龍與中國龍都大相徑庭（圖 14）。《聖經》中多

次出現龍，例如《啟示錄》上說：“天上又現出異象來：有一條大紅龍，七頭十角；七頭上戴著冠冕。它的尾巴拖拉著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sup>[22]</sup>前壁龍浮雕形象雖與《聖經》所描繪的龍的形象不完全吻合，如祇長兩個角而不是十個角，但同樣長著七個頭。這七個頭分別代表天主教義中的七宗罪，正中面帶詭異笑容的龍頭代表“驕傲”，左側三頭自上而下分別表示“忿怒”、“嫉妒”和“迷飲食”，右側從上到下分別象徵“迷色”、“慳吝”和“懈惰於善”<sup>[23]</sup>。總之，“聖母踏龍頭”這一組圖像，很難使人產生“天主教征服中國”的聯想<sup>[24]</sup>。但將《聖經》中的 dragon (拉丁語爲 drac, 葡萄牙語爲 dragão) 譯成“龍”字，前壁設計者即使不是最早，也是最早之一<sup>[25]</sup>。後來中國的“龍”與西方的 dragon 成了固定對譯辭彙，直到近幾年纔引發學界的廣泛反思與討論，有學者呼籲中國的“龍”音譯爲 loong 更爲合適（圖 15）。

但這幅象徵七宗罪的七首蛟龍圖像中的確有東方元素。其全身長滿鱗片以及足部四趾利爪均與一般光滑軀體的西方龍不同，而與中國龍相似，這或許是中國或日本工匠在雕琢時將中國龍的特徵賦予其中的緣故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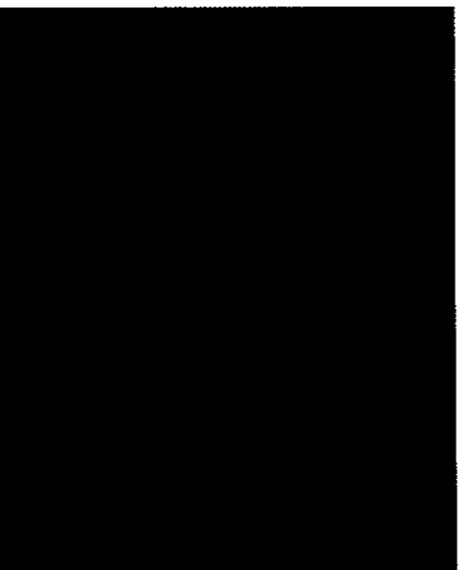


圖 14 前壁第三格七首怪獸和聖母雕像



圖 15 西方多首怪獸 (hydra) 形象，  
來源於互聯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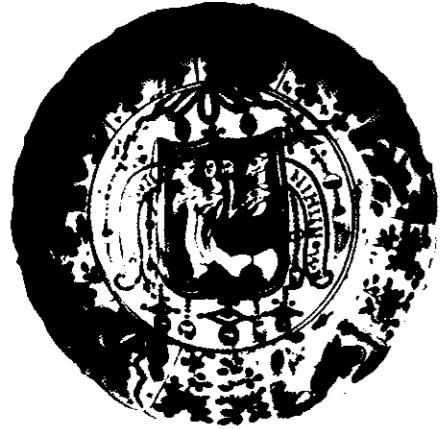


圖 16 A Museum in a Historic Site; The Monte Fortress of St. Paul, p. 40



圖 18 Peabody Essex 博物館藏紋章盤

有趣的是，一件藏於里斯本 Palacio de Santos 的據說屬於萬曆時期的青花瓷盤，繪有一幅七頭獸圖像<sup>[26]</sup>（圖 16）。印有同樣形制圖像的瓷器在大英博物館、Peabody Essex 博物館也有收藏，且在澳門龍嵩街出土的瓷片上也找到類似的圖像<sup>[27]</sup>（圖 17、18、19）。因為其兩側有西文，故應是根據西人來樣燒製的，主要用於外銷，而非本地使用，其多首怪獸圖像亦無中國本土文化淵源。

### 3. 滴水獅子

在前壁第三、四層兩側共有六隻小獅子雕像，用於排雨水。第三層每側兩隻，第四層



圖 17 澳門龍嵩街出土瓷片



圖 19 大英博物館藏紋章碗 以上三幅照片均引自劉朝輝、鄭培凱《澳門出土的克拉克瓷器及其相關問題探討》，未刊稿



圖 20 教堂前壁第三層左側的滴水獅子



圖 21 日本長崎浦上天主堂建築上使用的滴水獅子  
原教堂 1945 年因原爆成廢墟

每側一隻，原本可能亦為兩隻。其形象為中國式樣，與歐洲獅子形象不同。所有獅子軀體外伸，並向內側轉曲。凸目、巨鼻、闊口，面目略顯猙獰，四足呈匍匐狀，倒也憨態可掬。無獨有偶，建於 19 世紀的長崎浦上天主堂，也有中國式的滴水獅子雕塑。故推測聖保祿教堂前壁上的滴水獅子造型應為中國或日本工匠特別設計製作（圖 20、21）。

### 4. 雲紋、波浪紋

雲紋和波浪紋在東西方繪畫、雕塑和建築藝術中均是較為常見的素材，但在表現風格上有差異。在聖保祿教堂前壁第三層，圍繞在聖母銅像兩側的六個天使浮雕，下面四個天使膝下駕著雲朵；左面第三格聖母護航浮雕中，一艘葡萄牙三桅帆船正乘風破浪，大海中還有幾隻人面怪魚出沒。這裏出現的雲紋和波浪紋，與中國風格更為接近，或許也是中國或日本工匠以自己的經驗所做的發揮。但人面怪魚在這一時期西方航海圖像中較常見，或象徵淫欲與魔鬼誘惑<sup>[28]</sup>（圖 22、23）。



圖 22 天使駕雲



圖 23 帆船破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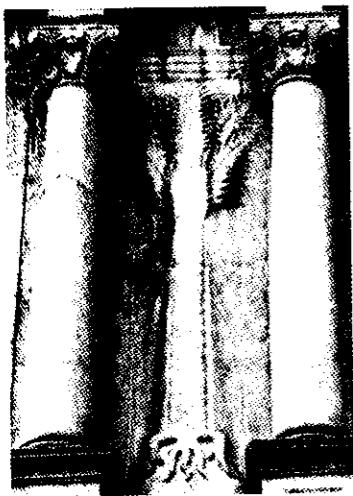


圖 24 棕櫚樹



圖 25 柏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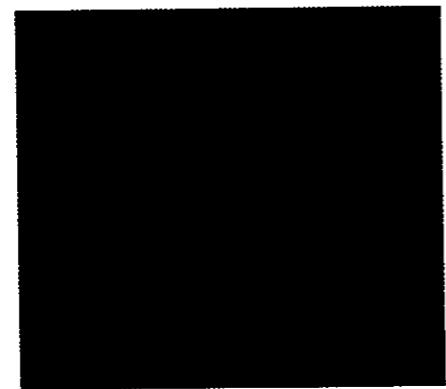


圖 26 大三巴前壁植物浮雕



### 5. 東方植物浮雕

在整個前壁上，尤其是在第三、四層，有大量裝飾性的植物浮雕，包括樹、花、枝、葉等。其中第二層中間窗洞兩側的棕櫚樹（象徵耶穌會的榮耀）和位於第三層聖母銅像右側的柏樹（象徵生命永恆）學界基本無異議，但對於其他植物，則多有不同說法（圖 24、25）。

例如第四層耶穌銅像兩側的花卉浮雕，有人認為是百合，百合是中國藝術的常見素材，但百合花為雙重三瓣，圖案中則至少是雙重四瓣，因此有人認為是薔薇，但薔薇的莖並不如此彎轉<sup>[29]</sup>。還有人認為其是牡丹。第三層左面聖母護航浮雕下方的裝飾圖案，一

般認為是結著果實的葡萄樹，象徵耶穌的軀體。再往左邊，魔鬼浮雕下方的裝飾圖案，有人說與上一幅一樣是葡萄樹，但有人認為是結滿果實的荔枝樹。第三層右側骷髏浮雕下方的圖案，有說是薔薇花，有說是菊花。若荔枝與菊花之說成立，則其可成為教堂前壁裝飾風格中帶有東方元素的又一例證（圖 26）。但這些植物到底是甚麼，還有待進一步辨認。

#### 附：旗杆夾石

在教堂前平臺左側，立有兩塊石板，頂部呈蓮花瓣形，每塊有對應兩孔，上圓下方，孔週有紋飾。不知立於何年，從與地面石板的銜接處看，應為後來植入，似為樹立旗杆之用。教堂前立旗杆、掛旗幟，這不是西方天主教的習慣做法。有人說原本不止這一組，另一邊還有，曾用於懸掛在中國朝廷獲得官銜的傳教士的旗幟，但未注明出處<sup>[30]</sup>。仔細觀察眾多現存澳門地志畫及其他圖像資料，亦未發現教堂前立有旗幟（圖 27）。

澳門聖保祿教堂前壁的修建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從 1602 年一直延續到 1640 年代，前壁的雕刻纔最後完成。由於這期間利瑪竇等耶穌會士的適應性傳教策略（accommodation）已為中國傳教事業打開局面，教堂前壁上所體現出的諸多東方元素不禁會讓人產生天主教本土化的思考傾向，甚至認為其是東西方文化、藝術融合的結果。但我們必須承認，前壁整體上表現的是天主教神學理念，少許的東方元素都是一些不甚重要的細節。我們已無法看到前壁設計的圖紙或其他有關其設計的文字資料，因此無法判斷這些包含東方藝術元素的細節是設計者有意為之，還是中國或日本工匠在施工過程中根據固有經驗的靈光一現。正因為如此，我認為不宜對這些元素加以過度解讀，在天主教本土化、適應性傳教策略等方面做發揮。

### 四、明清華人目中的聖保祿教堂

葡人入居澳門以後，西式的民居、教堂、防禦工事、官署等漸次出現，“高棟飛甍，



圖 27 大三巴旗杆夾石

櫛比相望”<sup>[31]</sup>，給當地華人百姓、官員、佛僧、天主教徒、旅澳文人均留下深刻印象。華人將澳門聖保祿學院及其教堂總稱為三巴寺。“三巴”是對 S. Paulo 的音譯，“寺”則是明清時期中國人對天主教堂的常用稱呼之一。相應地，聖保祿炮臺也被華人稱為三巴炮臺。本節以西方學界尚較少利用的中文文獻，尤其是明清時期的澳門詩詞<sup>[32]</sup>，考察澳門聖保祿教堂、學院建築羣給中國人造成的不同心理衝擊與印象。

### 1. 守澳官吏

明清政府為防“夷夏之變”，一直對澳門嚴加管治。明末設有提調、備倭等守澳官，萬曆二年（1574）在蓮花莖建關閘，天啟元年（1621）改設參將於前山寨；雍正九年（1731）移香山縣丞於前山寨，乾隆九年（1744）設前山寨海防同知，以縣丞屬之，移駐望廈村。

明政府最初祇允許葡人搭建臨時性的棚屋，但西人因貿易與傳教需要逐漸建起牢固的建築物，官方對此採取了默許態度。1594 年聖保祿學院及教堂建成，在整個修建過程中並未受到中國官員的干預<sup>[33]</sup>。1602 年重建教堂時，為抵抗荷蘭人的進攻而同時在教堂週圍修築城牆，此舉曾遭到澳門華人抗議，城牆工程停工<sup>[34]</sup>。1605 年澳門因不斷遭受荷蘭人的攻擊而再次築城，官府聞訊派兵干預，與修築城牆的日本僕役發生衝突，竟遭“抗殺”<sup>[35]</sup>，但廣東官方未採取進一步行動，被沈德符批為“利其寶貨，佯禁而陰許之”<sup>[36]</sup>。1606 年，耶穌會在澳門西側的小島青州上建了一所教堂，“高六七丈，闊敞奇闊”，華人視其為軍事堡壘，糾眾登島將其焚毀<sup>[37]</sup>；同時，澳門謠言四起，盛傳耶穌會勾結葡萄牙、荷蘭和日本，企圖先殺盡在澳華人，再武力征服中國，擁戴義大利耶穌會士郭居靜（Lazzaro Cattaneo，1560—1640 年）為皇帝。澳門華人陷入恐慌，紛紛逃往內地。此事後因郭居靜帶一位中國軍官到澳門參觀聖保祿學院、教堂和醫院等處，以證明確實無戰事跡象，纔告平息<sup>[38]</sup>。

萬曆四十一年（1613），海道副使俞安性入澳門查葡人蓄養倭寇問題，向澳葡官員下手諭一道，明令五禁，其一“禁擅自興作”云：“爾等獲準居住，本應建造矮小草屋，未想到爾等竟然起造高樓大廈。既然落成，本官不予追究。但為何建造大三巴如此寬敞高大之所，尚建炮臺，安放大炮？此為何謀？”對此葡人解釋道：“至於三巴寺一事，此乃本地基督徒居民前往祈禱之處，侍奉上帝。每逢禮拜天，信男信女前去作彌撒，聆聽神父佈道教誨。至於為何三巴寺擇其地而建之，普天之下，萬物唯有上帝高，天堂之內，亦以上帝為高。寺中均係神父，無一歹徒。建寺並不為過，因為世界各地常有祈禱之處。若官員懷

疑內有違背其意願之事或在禁之事，香山縣令及大人來澳時，盡可入內隨便仔細搜查。”<sup>[39]</sup>經此解釋，俞安性對手諭做了刪改，正式以中葡雙語頒佈《海道禁約》，仍規定“禁擅自興作：凡澳中夷寮，除前已落成，遇有壞爛，準照舊式修葺，此後敢有新建房屋，添造亭舍，擅興一土一木，定行拆毀焚燒，仍加重罪。”<sup>[40]</sup>但此禁約並無多少約束力，此後澳門仍不斷修建包括教堂、炮臺在內的新建築物。

乾隆十四年（1749），剛卸任澳門同知的張汝霖與香山縣令暴煜制定《澳夷善後事宜》十二條，其中再次禁止“擅興土木”：“澳夷房屋、廟宇，除將現在者逐一勘查，分外造冊存案外，嗣後止許修葺壞爛，不得於舊有之外添建一椽一石，違者以違制律論罪，房屋、廟宇仍行毀拆，變價入官。”<sup>[41]</sup>

印光任、張汝霖在 1744—1749 年間先後任澳門同知，卸任後撰成《澳門記略》。他們對澳門西洋建築有實地考察，故描述甚詳：“屋多樓居。樓三層，依山高下，方者、圓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諸花果狀者，其覆俱為螺旋形，以巧麗相尚。垣以磚，或築土為之，其厚四五尺，多鑿牖於週，垣飾以堦。牖大如戶，內闔雙扉，外結鎖窗，障以雲母。樓門皆旁啟，層階數十級而後入，窈窕詰屈，已居其上，而居黑奴其下。”<sup>[42]</sup>印光任有《雕樓春曉》、張汝霖有《澳門寓樓即事》、《寓樓舒望》等詩作描寫澳門建築<sup>[43]</sup>。

《澳門記略》中也記錄了他們對三巴寺的印象：“寺首三巴，在澳東北，依山為之，高數尋。屋側啟門，側制狹長，石作雕鏤，金碧照耀，上如覆幔，旁綺疏瑰麗。所奉曰天母，名瑪利亞，貌如少女，抱一嬰兒，曰天主耶穌。衣非縫製，自頂被體皆採飾平畫，障以琉璃，望之如塑。旁貌三十許人，左手執渾天儀，右又指若方論說狀，鬚眉者如怒，揚者如喜，耳重輪，鼻隆準，目若矚，口若聲。上有樓，藏諸樂器。有定時臺，巨鐘覆其下，立飛仙臺隅，為擊撞形，以機轉之，按時發響。僧寮百十區，蕃僧充斥其中。”<sup>[44]</sup>此描述較之 Peter Mundy 的記載更詳，為我們提供了教堂焚毀前的內部景象。

印光任還特別詳細描述了三巴寺的時鐘和風琴<sup>[45]</sup>，體現了其對西洋製造工藝和音樂的濃厚興趣。並有《三巴曉鐘》詩：“疎鐘來遠寺，籟靜一聲閑，帶月清沉海，和雲冷度山。五更昏曉際，萬象有無間。試向蕃僧問，曾能識此關”<sup>[46]</sup>。這首描寫天主堂鐘聲的詩，卻刻畫出一幅濱海古刹晨鐘暮鼓的禪意，面對三巴寺，作者的心緒彷彿在耶釋之間來回穿越。

### 2. 教徒

康熙十九年（1680），清初江南著名文人教徒吳歷（漁山）和陸希言（思默）隨耶穌

會士柏應理 (Philippe Couplet, 1622—1693 年) 至澳門，準備前往歐洲學習天主教神學，因故滯留澳門兩年有餘，駐三巴寺學道<sup>[47]</sup>。陸希言有《澳門記》載此事，而吳歷則有《三巴集》共百十二首，其中《澳中雜詠》三十首記三巴學道經歷及澳門見聞，餘八十二首為吟詠教理之聖學詩<sup>[48]</sup>。

陸希言《澳門記》云：

余於康熙庚申之冬仲，追隨信未柏先生至其地，未至前山，遙望如一葉荷葵，橫披水面。迨其莖，則有闢焉，職司啟閉，以別界之內外也。進而稍近，則樓閣層層，高者依山巔，低者傍海邊。緣崖屈曲，恍然一幅佳山水。至如其境，見城無百堵，眾無一旅，家無積粟，淒涼滿襟。……天主堂之不一，曰聖伯多祿堂，聖保祿堂，聖多明我堂，聖方濟各堂，聖奧吾思定堂，聖安多尼堂，聖老楞佐堂，聖辣匝羅堂。同一聖教會，而昭事欽崇，但作聖之功不同，故建堂而各自焚修焉。……聖保祿堂，俗稱訛為三巴，是耶穌會所居，修雖苦而行不外露，禮從俗而規矩愈嚴，不特絕色、絕財，並絕意，而惟順長之命，且絕位而無居上之心。……故三巴堂，獨高昂而□□，百凡功業，均與他堂不同。惟守誠持齋，七時祈禱，聽鐘聲而□□□，此無異焉。<sup>[49]</sup>

陸希言所見之澳門，因為清代遷海令而陷入蕭條。儘管如此，澳門的建築和教堂仍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作為文人教徒，他能夠區分天主教各修會及其所屬各堂之別，但對耶穌會與三巴寺更為瞭解和認同。

“年垂五十，學道於三巴”的吳漁山，有挑燈勤學西文之苦（燈前鄉語各西東，未解還教筆可通。我寫蠅頭君寫爪，橫看直視更難窮<sup>[50]</sup>）；也有獨坐三巴寺窗前思鄉的惆悵（九九不飛宜瑞雪，常如梅候潤衣衫。樓頭日坐閑龍氣，池面時添海雨鹹<sup>[51]</sup>）；與年輕的同窗一同聞鈴聽道（性學難逢海外師，遠來從者盡兒童。何當日課分卯酉，靜聽搖鈴讀二時<sup>[52]</sup>）；品嘗著豐富的精神食糧（性理由來與道親，新詩吟罷一凝神。死前誰信天鄉樂，了後方驚獄火真。浮世功名鴻爪雪，勞生軀殼馬蹄塵。流光況復催人急，擬向真原細問津<sup>[53]</sup>）。

三巴寺，又稱聖母堂，前壁中心位置為聖母瑪利亞銅像。吳漁山苦修其中，亦從聖母那裏獲得慰藉。其聖學詩中，有《慶賀聖母領報二首》，讚美貞潔聖母和耶穌基督的誕生。

詩云：“救世宏基肇聖胎，福音乍報主神來。乾坤莫囿貞懷蘊，久局天衢今始開”；“永福之門此日開，尊神報命自天來。肋霞郡<sup>[54]</sup>內朝元後，萬物真君降聖胎”<sup>[55]</sup>。

三巴寺前壁第二層置放耶穌會四位聖徒銅像，從左至右分別為聖方濟各·玻爾日亞 (S. Francis Borgia, 1510—1572 年)、聖依納爵·羅耀拉 (S. Ignatius Loyola, 1491—1556 年)、聖方濟各·沙勿略 (S. Francis Xavier, 1506—1552 年) 和聖類斯·公撒格 (S. Louis de Gonzaga, 1568—1591 年)。這四尊銅像當是在澳門博卡羅鑄炮廠鑄造的。吳漁山每日瞻仰四位聖徒塑像，並將他們視為自己修道的榜樣。在其聖學詩中有四首分別歌頌這四位耶穌會聖徒，稱讚其美德與道行<sup>[46]</sup>。

經過兩年多的三巴學道，吳漁山對天主教和西洋文化有了更為深入的理解，為其最終形成華化天學思想奠定了基礎。1682 年，自幼領洗的吳漁山終於成為一名耶穌會士；1683 年，吳漁山返回江南，在上海、嘉定一帶傳教逾三十年。1688 年晉升為司鐸，1718 年在上海去世，葬於南門外天主教墓地。

### 3. 佛僧

在澳門城牆北面，有華人漁民聚落望廈村，相傳天啟年間這裏落成了普濟禪院，成為澳門佛教中心<sup>[47]</sup>。明清時期佛教僧侶往還澳門多寓居於此。番禺僧人釋跡刪 (1637—1722 年) 於康熙中期兩度至澳門，即住在禪院。在澳門期間他寫下了八首詩作，有兩首提到三巴寺，其中《遊澳門宿普濟禪院贈雲勝師》云：“珠林遙隔水雲村，百里尋僧日欲昏。行逐鮫人趁番市，漸聞駛舌雜華言。山鐘近接三巴寺，海氣晴分十字門。到處不妨吾道在，島夷今識法王尊。”<sup>[48]</sup>另有一首《三巴寺》：“暫到殊方物色新，短衣長帔稱文身。相逢十字街頭客，盡是三巴寺裏人。箬葉編成誇皂蓋，檻輿乘出比朱輪。年來吾道荒涼甚，翻羨侏離禮拜頻。”<sup>[59]</sup>

其用詞表露出對“夷人”、“異教”的鄙視，但心態上卻從最初的“到處不妨吾道在”變為“年來吾道荒涼甚”，反羨慕三巴寺內的“禮拜頻”。感慨澳門佛教不興的同時，也想借天主教以勵佛教。

### 4. 旅澳文人、士大夫

澳門的西式建築羣，以及西人的信仰與習俗，使這裏成為中國大地上的一處“異度空間”，吸引著大量中國遊客前來一遊。不少旅澳文人墨客和士大夫用文字記錄下了他們的所見所聞與所感，澳門大三巴更成為他們吟詠的焦點內容。

#### (1) 吟詠教堂外貌與內景。

旅澳文人、士大夫感於三巴寺外部的壯觀及內部的華美，故多有詠歎。如曾任番禺教諭（1655年）的陳衍虞（1603—1688年）有《由香山入濠鏡澳遍遊天主寺》，云：“岌峯列寶坊，金碧競崎麗。彝女日為羣，密受番僧誓。”<sup>[60]</sup>“列寶坊”指三巴寺，因其中多藏寶物，也被稱為“多寶寺”。

康熙二十二年（1683）奉命巡視粵閩沿海的杜臻（？—1703年），曾至澳門，並有《香山澳》，云：“濠鏡直臨大海岸，蟠根一莖如仙芝。西洋道士識風水，梯航萬里居於斯。火燒水運經營慘，雕牆峻宇開通衢。堂高百尺由突兀，丹青神像儼鬚眉。金碧螢煌五采合，珠簾紱柱圍蛟螭。風琴自鳴天籟發，歌聲嗚嗚彈朱絲。”<sup>[61]</sup>贊三巴寺之巍峨、建築之富麗堂皇、雕鏤之精美、寺中繪畫之逼真及風琴發出的天籟之音。

1684年曾讀書於前山寨並至澳門的劉世重（？—1702年）寫有《三巴寺》詩，云：“地入蠻方盡，天連嶺嶠高。坐堂環白鬼，聽法間紅毛。殿閣標雲靄，山門疊海濤。西洋傳佛國，金相果稱豪。”<sup>[62]</sup>除歎三巴寺之高大，亦指出間或有荷蘭人（紅毛）至其中禮拜。該年荷蘭人呂文森再次率領四艘商船到達澳門，並通過賄賂廣東官員獲得允許在澳門附近貿易<sup>[63]</sup>。三巴寺中出現的紅毛或與此事有關，但顯然信奉新教的荷蘭人不是來聽彌撒的。

廣東番禺明遺民學者兼詩人屈大均（1630—1696年）或曾遊歷澳門，在其所著《廣東新語》中描述了澳門西洋建築，尤其是三巴寺：“澳有南臺、北臺。臺者山也。以相對，故謂澳門。番人列置大銅鏡以守。其居率為三層樓，依山高下。樓有方者，圓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諸花果形者，一一不同，爭以巧麗相尚。己居樓上，而居唐人其下，不以為嫌。山頂有一臺，磴道橫貫，常登以望舶。其麓有東望洋寺、西望洋寺。中一寺曰三巴，高十餘丈，若石樓，雕鏤奢麗。”<sup>[64]</sup>屈大均總結出西洋建築的外形特點，尤讚歎大三巴的高聳與奢麗。多數文人士大夫均在詩中突出了三巴寺的這一特點。如廣東南海人黃呈蘭（1705—？年）的《澳門》云：“海市遠通門十字，蜃樓高聳寺三巴。怪來異域乘潮至，爭說中原盛物華。”<sup>[65]</sup>《清玉案·澳門》：“綺窗朱檻，玉樓雕鏤，這是三巴寺。”<sup>[66]</sup>

此外，還有許多詩詞中提到三巴寺的風琴<sup>[67]</sup>和鐘聲。如曾遊澳門的廣東南海人葉廷樞（1752—約1808年）《澳門雜詠》：“大小三巴兩寺門，玉闌幹影照黃昏。鐘聲忽動遊人返，來謁樓頭十字尊。”<sup>[68]</sup>道光二年（1822）進士、廣東高要人黃德峻《澳門》：“潮落海門分十字，鐘鳴山寺禮三巴。（原注：山有三巴寺，每七日為期，侵晨撞巨鐘，聲聞十數里。夷人男婦咸集，聽僧演說，名曰禮拜。）”<sup>[69]</sup>除了響徹澳門的鐘聲，詩人們也描繪了

澳門市民聞鐘聲前往教堂禮拜的景象。

三巴寺亦曾引發文人士大夫對宗教的深思，如1681—1689年間任兩廣總督的吳興祚，曾至澳門，作《三巴堂》：“未知天外教，今始過三巴。樹老多秋色，窗虛迎月華。誰能窮此理？一語散空花。坐久忘歸去，聞琴思伯牙。”<sup>[70]</sup>

## （2）三巴寺禮拜儀式。

有些文人士大夫也記載了三巴寺內禮拜、彌撒的儀式。屈大均《廣東新語》云：三巴寺“奉耶蘇為天主，居之僧號法王者司其教。凡番人有罪至寺，法王不許懺悔，即立誅斬；許懺悔，則自以鐵鉤鉤四體，血流狼藉，以為可免地獄之患。男女日夕赴寺禮拜，聽僧演說。寺有風樂，藏革櫃中不可見。內排牙管百餘，外接以囊，噓吸微風入之，有聲鳴嗚自櫃出。音繁節促，若八音並宣，以合經唄，甚可聽。”<sup>[71]</sup>包括屈大均在內的大多數教外人士對天主教無深入之瞭解，故有“立誅斬”等描述與想像，而鐵鉤鉤體，或許是聽聞天主教苦修故事而加以發揮。屈大均另有《澳門》詩云：“禮拜三巴寺，蕃官是法王。花襦紅鬼子，寶鬟白蠻娘。”<sup>[72]</sup>

金采香《澳門夷婦拜廟詩》共八首，其中前三首對西洋婦女至教堂禮拜的情形描繪甚詳：

三巴門內瑞煙開，夷婦殷勤禮拜來。席地跏趺忘日永，氤氳人氣繞蓮臺。

（原注：夷廟名大三巴者，創自前明時。巍然屹立，俯視全澳。其鐘樓垂三百年，時刻無纖毫舛誤。廟門石柱，曾累而上凡三接，若有神助者。其俗禮拜曰好日，每七日一禮拜。是日老少畢集，奴婢成羣，相率跪佛前聽講。香煙人氣，滿空氤氳，竟日不倦。）

一雙纖手嫩於蓮，對佛持經志益虔。百八牟尼剛數罷，堂頭法語又宣傳。

（原注：夷性喜修指甲。多有識本國文字者。持經一卷，息心默誦。無老少咸手戒珠。一日中沙彌屢傳法語，如開導然。）

一聲棒喝碧天寥，靜撫風琴古韻遙。彷彿魚山聞梵唄，羣芳屏息謝塵囂。

（原注：廟門內有經閣，和尚誦經其上。每誦畢，奏夷樂一回，其風琴有太古遺音。堂左有小圓臺，高五尺許，圍以白紗。沙彌拾級而登，手舞足蹈，為說一切法。羣屏息點頭，似有所悟。）<sup>[73]</sup>

全詩重點實不在天主教儀式，而在“夷婦”，第四至八首格調近韓鵠《澳門番女歌》<sup>[74]</sup>，表現了作者的風流才情。

描寫三巴寺的這些詩詞文字，多用佛教術語，這種張冠李戴並非作者有意為之，而是其尚未熟諳天主教的緣故。湯顯祖《牡丹亭》第二十一齣中，有這樣一個情節：“（老旦扮僧上）一領破裂裟，香山嶼裏巴<sup>[75]</sup>，多生多寶多菩薩，多多照證光光乍。小僧廣州府香山嶼多寶寺一個住持，這寺原是番鬼們建造，以便迎接收寶官員。茲有欽差苗爺任滿，祭寶於多寶菩薩位前，不免迎接。”<sup>[76]</sup>劇本中“多寶寺”成了佛寺，神父成了佛僧，耶穌成了菩薩，將聖保祿教堂整個變為一處佛教寺院的場景。

### (3) 海防。

聖保祿教堂及其右側的炮臺，前者為拯救人類靈魂之所，亦可被解讀為異教入侵之基地，後者則是武力征服與殺戮的象徵。加之兩者均甚雄壯，不免引發來此參觀的中國文人士大夫“以夷變夏”的隱憂。屈大均即在多首詩中表達了這一憂慮，如云：“外國頻挑釁，西洋久伏戎。”<sup>[78]</sup>“築城形勢固，全粵有餘憂。”<sup>[78]</sup>“山頭銅鏡大，海畔鐵牆高。一日蕃商據，千年漢將勞。”<sup>[79]</sup>

香山人陳官《澳門竹枝詞》云：“澳門禮數異中華，不拜天尊與釋迦。濛湧鏡光樓六角，山飛蹬道寺三巴。”<sup>[80]</sup>特別指出天主教與儒、釋均不相同，而劉世重《澳門》詩云：“窮島陰崖有浪痕，銀樓粉閣自乾坤。番童夜上三巴寺，洋舶星維十字門。斜日聽鐘纔早供，妙檀羅拜又黃昏。思傳六籍將夷變，令識中華禮教尊。”<sup>[81]</sup>則反其道而行之，希望中華禮教能夠變夷為夏。

### (4) 淫窟。

神父常於天主教堂告解室中聆聽信徒懺悔，相對私密的空間引發了中國人的好奇與想像。屈大均《廣東新語》云：“女入寺，或惟法王所欲，與法王生子，謂之天主子，絕貴重矣。”<sup>[82]</sup>廣東順德人張琳（1770—1825年）《澳門竹枝詞》亦云：“少婦朝昏進願香，寶髻錦襦門新狀。娉婷同到三巴寺，笑願生兒仗法王。（原注：寺奉耶穌天主，僧號法王者司其教。男女朝夕禮拜。女惟法王所欲，與法王生子則貴重。）”<sup>[83]</sup>教士難耐寂寞、違背教規之事，在西方教會史上所見多有，但此為隱秘的勾當，而非公開的習俗。然而在中國人眼中，婦女入堂懺悔，教士趁機與之有染，成了“夷人”惡俗。

方以智（1611—1671年）更認為三巴寺中夷婦夷僧媾和與佛教密宗相類<sup>[84]</sup>，而梁學昌評曰：“三巴寺以納澳婦為懺悔，見方密之《物理小識》。何淫邪至於如此？曰窮其斷

欲之弊，必至如此。乃魔道也。”<sup>[85]</sup>以此抨擊天主教之禁欲，並斥其為邪教。

已入內地傳教的西方教士，感受到的中國倫理壓力更大，因此採取了多種特別的方法向中國婦女傳教，且建有男教堂、女教堂，以避免因男女信徒同至一堂而引發外人攻擊<sup>[86]</sup>。

### 5. 澳門華人百姓

長期居住於澳門的華人百姓，對以

三巴寺為中心的西洋建築羣又有如何的感受？儘管無法找到他們自己的描述，但通過傳教士西文文獻和中國官方文獻等，我們還是可以大致勾勒出三巴寺在當地普通華人百姓心中的印象。前文已提到，聖保祿教堂重修時，曾遭到華人百姓的阻撓，華人主要反對耶穌會在修建教堂的同時修築城牆；而耶穌會在青州島上修建的教堂則遭華人百姓的焚毀。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聖保祿學院長期招收、培訓華人兒童、青年，希望他們在傳教事業中發揮作用；不僅當地華人教徒常來教堂中參與宗教儀式，與澳門臨近的其他縣，也有許多教徒來澳門參加宗教活動，耶穌會甚至專門為華人信徒修建修院和教堂（唐人寺）。耶穌會在澳門開辦的醫療慈善機構起到了緩和當地的華夷矛盾的作用。這些都不必多論，下面僅簡單談談聖保祿教堂於1835年被焚毀後的情形。

遭焚毀的教堂和學院遺址一片荒涼狼藉，再加上教堂中曾埋葬很多傳教士和日本教徒的屍骸<sup>[87]</sup>（見圖28），這一帶使澳門華人更感覺陰森恐怖。光緒十四年（1888），當地華人在聖保祿遺址一旁建起一座哪吒廟，供奉能夠降妖捉怪的哪吒三太子。石柱刻一對聯：

何者是前身漫向太虛尋故我

吾神原直道敢生多事惑斯民

橫批：保民是賴

天主連供奉自己的教堂都保護不了，看來保民還需本土神仙。這或許是建哪吒廟的潛臺詞吧。此外，位於聖保祿教堂遺址南面的關帝廟和女媧廟，亦建於光緒年間，大約亦是同樣心態下的產物<sup>[88]</sup>（圖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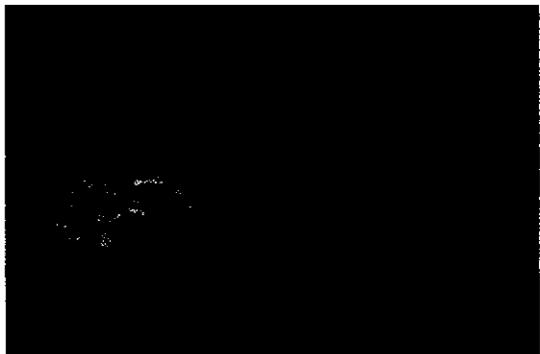


圖28 聖保祿教堂遺址出土的骸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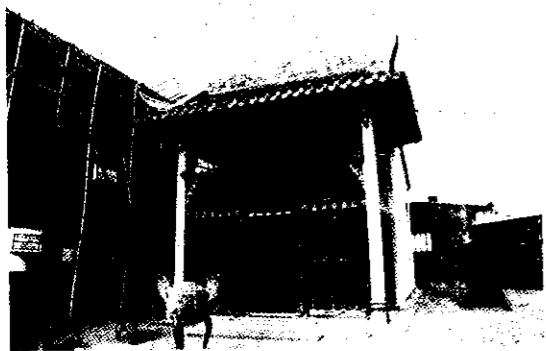


圖 29 聖保祿教堂遺址一旁的哪吒廟，建於 188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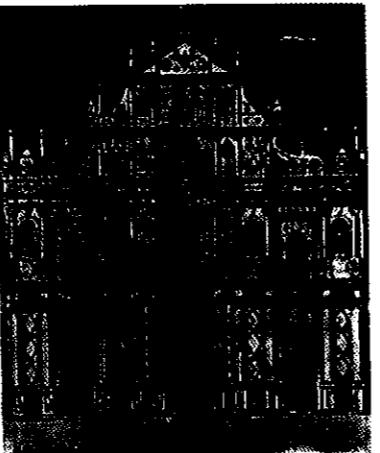


圖 30 “大三巴牌坊” Baron de Reichenau 繪

大火後僅存的教堂前壁，被澳門華人稱為“大三巴牌坊”。“牌坊”本是中國傳統社會為宣揚禮教、標榜功德、榮宗耀祖、旌表貞烈而建的紀念性建築物，而澳門華人卻用這個詞來稱呼一座天主教堂的前壁。這固然因為在外型上，兩者存在相似性，但我們也可以從中體會到，外來事物在中國人心目中產生印象的過程中，固有的傳統文化的干預與影響。也就是說，澳門華人心中固有的中國傳統牌坊形象與內涵，被轉用於他們對天主教堂建築的認識與理解上（圖 30、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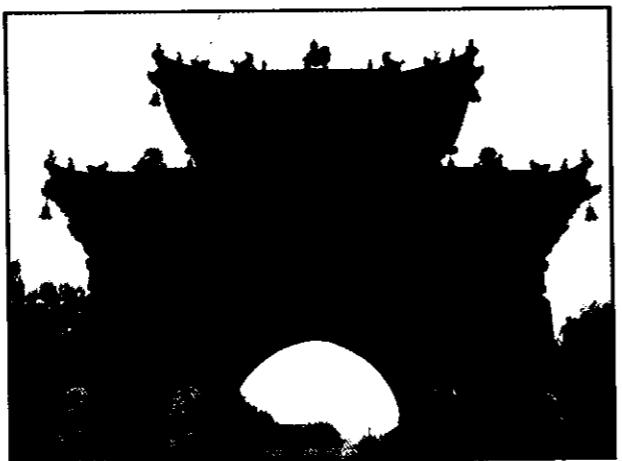


圖 31 山東淄博桓臺“四世宮保”牌坊 始建於 1619 年，為國內現存最大的磚結構牌坊。源自互聯網

## 五、結語

建築從多個角度體現文化，而建築本身亦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每一座建築都有其

樣式與風格、目的與功能，社會文化不同，建築的風格和功能也就不同。人類建築的多樣性是人類社會文化多樣性的體現；建築形式與風格的演變，則體現了社會文化的變遷。建築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是通過建築的風格和功能考察蘊藏於其中的社會文化和思想。而與繪畫、雕塑不同的是，建築物佔據著一個較大的物質空間，同時也營造出一個更大的社會空間。因此，建築物所處的空間位置及其意義，建築物營造出的空間所發揮的社會功能與影響，都是建築史研究不應忽視的重要問題。

澳門在葡萄牙人於 16 世紀中葉入居以後，四百年間逐漸形成了一個西式城市建築羣，包括民居、商館、政府部門建築、教堂和修院、學校、醫院等，其中最著名且一直作為澳門地標的建築便是聖保祿教堂。19 世紀後期以來，針對聖保祿教堂尤其是其存在至今的前壁的研究已有很多，但大都局限於教堂建築過程、格局、藝術風格和宗教內涵等方面，所依據的也大都是西文文獻。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主要側重於考察該教堂所處的宏觀空間位置及其意義，在澳門本地所營造出的社會空間及其社會功能，同時通過中文資料著重闡述了不同中國人對該教堂的看法。

從宏觀空間來看，澳門聖保祿教堂建在遠東天主教網路的核心位置，在天主教在東亞傳播過程中發揮著中樞作用，這一作用體現在傳教資金保障、傳教人員培訓、教會行政區劃與領導等方面，此外，在日本和中國發生教難期間，澳門亦成為日、中部分教徒的避難所。從澳門本地城市發展來看，以位於高地的聖保祿教堂為中心所形成的建築羣（包括聖保祿學院、炮臺、唐人廟、仁慈堂及其慈善機構等），一直是澳門社會發展的核心區域，是澳門城市最主要的信仰、教育、軍事、慈善、娛樂空間，塑造著澳門的城市生活。

至今矗立在原址的教堂前壁，包含有一些東方藝術元素，但均為細枝末節，未改變西式教堂的整體特徵，因此我們不能說該教堂融匯了東西方建築的不同風格，亦不能因少許的東方元素而在耶穌會適應性傳教策略乃至天主教本土化方面有更多的聯想與闡發。不論澳門聖保祿教堂體現的是巴羅克風格主義還是耶穌會自己的風格，在中國人心目中，它都是西洋宗教、藝術與文化的代表。

這個在中國領土邊陲出現的異文化空間，引起了澳門本地和內地華人的關注，並留下大量有關聖保祿教堂及其週圍建築羣的記載。守澳官吏和內地官員、士大夫多從夷夏觀念與海防角度關注這座教堂和位於一側的炮臺與城牆，主張加強對夷人、夷教的控制；他們對教堂外貌、夷人教俗也多有觀察和記述，驚歎建築雄偉壯觀之外，亦對夷教異俗多有抨擊。吳漁山、陸希言等文人，作為一度居停澳門的奉教者，對聖保祿教堂有細緻的觀察和

描述，他們不僅熟知教內各不同修會，而且通過在澳門期間的學習，進一步加深了對天主教的認識；教堂前壁的聖母像以及四位耶穌會聖人像也都成為吳漁山詩作讚頌的對象。澳門普濟禪院及南粵過往澳門的佛教僧侶對咄咄逼人的聖保祿教堂既羨慕又厭惡，但畢竟佛教與天主教在澳門呈井水不犯河水之態，長期共存而未發生激烈的爭辯。聖保祿學院和教堂於1835年毀於火災之後，這一帶成為荒漠之區，當地華人在遺址邊緣建起哪吒廟以鎮妖辟邪，建築這一廟宇的舉動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澳門本地華人百姓對天主教的心態。

本文首次從空間與心理的角度研究澳門聖保祿教堂建築，突出建築物所在的位置空間和其所營造出的社會空間，並著重分析這一外來文明所營造出的新空間在當地的社會功能，以及對華人的視覺衝擊和心理影響。這祇是對出現於東方的西式教堂建築的一個研究嘗試，澳門聖保祿教堂或許不是最為典型的個案，北京的南堂、北堂、東堂和西堂，以及建於日本、馬尼拉、馬六甲、果阿等地的早期西式教堂（圖32、33），或均可從這一角度重新加以研究。



圖32 日本白杵（Usuki）、府內（Funai）、有馬（Ariama）、安土（Azuchi）教堂 版畫，Courtesy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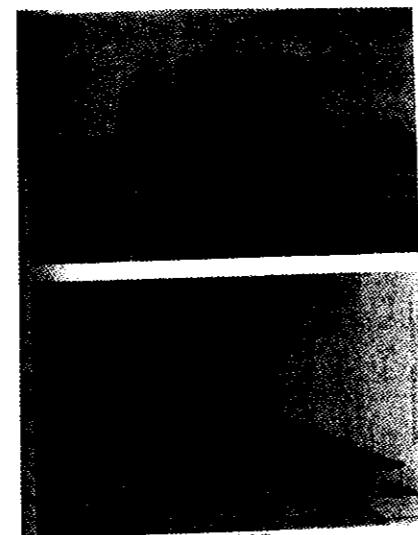


圖33 北京南堂 余三樂《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明末清初的北京天主教堂》，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頁131

附記：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資助成果，特此致謝！

### 註釋：

- [1] François Lebrun and Elisabeth Antébi, *Les Jésuites ou la gloire de Dieu*, Paris: Éditions Stock-Antébi, 1990, p. 76.
- [2] Peter Mundy,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 1608-1667*, Vol. III, Part I, Cambridge: Print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1919, pp. 162-163.
- [3] 關於澳門聖保祿學院，李向玉利用葡文資料做了深入研究，參見氏著《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中華書局，2006年。
- [4] João Feliciano Marques Pereira, *Em Prol de umas ruinas (A propósito do frontespício de Collegio de S. Paulo, em Macau)*, in *Ta-Ssi-Yang-Kuo*, Serie I, Vols. I-II, pp. 483-492.
- [5] Manuel Teixeira, *The Church of St. Paul in Macau*, Lisboa: CEHU da Junta de Investigação Científica do Ultramar, 1979. Manuel Teixeira, *A Façada de S. Paulo*, 2nd ed., Imprensa Oficial de Macau, ca. 1987.
- [6] Fernando António Baptista Pereira, *As Ruinas de S. Paulo*, Macau/Lisboa: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Missão de Macau em Lisboa, 1994.
- [7] Gonçalo Couceiro, *A Igreja de S. Paulo de Macau*, Lisbon: Livros Horizonte, 1997.
- [8] 邢榮發《明清澳門城市建築研究》，香港：華夏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
- [9] Cesar Guillen Nuñez, *Macao's Church of Saint Paul, A Glimmer of the Baroque in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 [10] Louis Antonin Berchier, *The Mysteries of the Mater Dei: Façade at Macao*, Macao: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 A. E. de Macau, 2010.
- [11] 參見莫小也《地志畫與澳門地志畫研究述要》，《文化雜誌》總第49期，頁145—170，2003年；Francisco Roque de Oliveira, “Cartografia Antiga da Cidade de Macau, c. 1600-1700: Confronto entre Modelos de Representação Europeus e Chineses,” in *Scripta Nova, Revista Electrónica de Geografía y Ciencias Sociales*, Universidad de Barcelona, Vol. X, núm. 218 (53), 1 de Agosto de 2006, pp. 1-37.
- [12] 關於澳門日本人，參見Manuel Teixeira, *The Japanese in Macao in the XVIth and XVIIth Centuries*,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4；湯開建、吳青《明季寓居澳門的日本基督徒及廣東政府的管治與防範》，《中華文史論叢》2008年第1期，頁201—242。
- [13] Manuel Teixeira, *The Church of St. Paul in Macau*, pp. 66-69.
- [14] 同注8，頁78—85。
- [15] 同注2, pp. 274-275.

- [16] Project Team of the Museum of Macau (ed.), *A Museum in a Historic Site: The Monte Fortress of St. Paul*, Macao: Museu de Macau, 1999, p. 45.
- [17] 參見拙著《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頁 64—88、158—16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 [18] 《奏記》見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頁 29—32，趙春晨點校，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年。關於查禁唐人廟一事，參見劉芳《清乾隆年間查禁澳門唐人廟事件》，《社會科學論壇》2010 年第 3 期，頁 180—184。
- [19] Fernando Antonio B. Pereira, “The Acropolis of Macau, The Religious, Cultural and Military Complex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in *A Museum in a Historic Site: The Monte Fortress of St. Paul*, pp. 38, 43.
- [20] 同注 10, p. 27.
- [21] 同注 8, 頁 105—106。
- [22] 《聖經》中英對照新標點和合本，頁 2180，香港：香港聖經公會，2008 年。
- [23] 關於天主教義中的七宗罪，明末入華耶穌會士有詳細論述，參見龐迪我《七克》，《天學初函》本，臺北：學生書局，1964 年。此處譯名均採用《七克》譯法。相關討論也可參見邢榮發《明清澳門城市建築研究》，頁 118—119。
- [24] 有學者認為，“龍在中國代表皇帝與皇權，而在西方則代表魔鬼，因此這一混合圖像不免蘊含著這樣的威脅：基督教顛覆中國皇權”。Jeremy Tambling and Louis Lo, *Walking Macao, Reading the Baroque*, Hong Kong: United League Graphic & Binding Co. Ltd., 2009, p. 84. 我不認同這一後現代式的過分解讀。
- [25] 利瑪竇、羅明堅 1580 年代初編的《葡漢辭典》，將 *drago* 譯為“蛟”（見利瑪竇中西文化研究所、葡萄牙國家圖書館和東方葡萄牙學會 2001 年聯合出版的新版本，頁 85），因蛟在中國文化中更多為負面意義，故這一譯法實更為貼切。
- [26] 同注 [19], 頁 40, 44。作者僅根據此青花瓷盤便推測多首獸圖像似乎在萬曆年間流行於東方，但是，顯然這些瓷器均為專門外銷而製。
- [27] 劉朝輝、鄭培凱《澳門出土的克拉克瓷器及其相關問題探討》，未刊稿。感謝復旦大學文博系劉朝輝教授惠贈此文章。
- [28] 同注 8, 頁 115—116。
- [29] 同注 8, 頁 109—110。
- [30] 同注 10, p. 32.
- [31]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頁 20。

- [32] 業師章文欽先生以十餘年之心力，撰成《澳門詩詞箋注》（三卷四冊，澳門文化局/珠海出版社，2003 年），本文所徵引之詩詞文獻，大都由此而來。
- [33] 《范禮安致耶穌會總會長》，1594 年 11 月 9 日，澳門，轉引自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一卷，頁 251，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
- [34] 利瑪竇、金尼閣，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頁 523，中華書局，1983 年。
- [35] 《明神宗實錄》卷五二七，萬曆四十二年十二月乙未條。
- [36]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三十，頁 785，中華書局，1959 年。
- [37] 參見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頁 523；戴裔煊《明史·佛郎機傳箋正》，頁 89—9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年。
- [38] 同注 34, 頁 524—541。
- [39] 此為俞安性手譜及葡人答詞的葡文本，轉引自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頁 71—77，澳門基金會，2000 年。
- [40] 同注 31, 頁 22。
- [41] 同注 31, 頁 37—38。
- [42] 同注 31, 頁 60。
- [43] 同注 31, 頁 60—61。此三首詩之箋注，參見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頁 123、136—148、151—152。
- [44] 同注 31, 頁 62—63。
- [45] 同注 31, 頁 74—76。
- [46] 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頁 130。
- [47] 對吳歷最新、最深入的研究，參見章文欽《吳漁山及其華化天學》，中華書局，2008 年。
- [48] 陸希言《澳門記》，法國國家圖書館編號 Courant 2948，影印本見鍾鳴旦、杜鼎克、蒙曇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 11 冊，第 425—431 頁。吳曆《三巴集》箋注本，見章文欽《吳漁山集箋注》，頁 159—262，中華書局，2007 年。
- [49] 《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 11 冊，頁 428—429。
- [50] 章文欽《吳漁山集箋注》，頁 179。
- [51] 同上，頁 176。
- [52] 同上，頁 178—179。
- [53] 同上，頁 240。
- [54] 指耶路撒冷聖城。
- [55] 同注 50, 頁 192—193。

- [56] 同注 50，頁 208、211、215、218—219。
- [57] 見姜伯勤《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年。
- [58] 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頁 85。
- [59] 同上，頁 90。
- [60] 同上，頁 9。
- [61] 同上，頁 47。
- [62] 同上，頁 54。
- [63]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一卷，頁 669—670。
- [64]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地語·澳門》，頁 36，中華書局，1985 年。
- [65] 同注 58，頁 169。
- [66] 同注 58，頁 170。
- [67] 提到三巴寺風琴的詩文，參見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頁 108。
- [68] 同注 58，頁 182。
- [69] 同注 58，頁 250。
- [70] 同注 58，頁 42。
- [71] 同注 64，頁 36—37。
- [72] 同注 58，頁 78。
- [73] 同注 58，頁 324—325。金采香，生平不詳，從該詩內容可斷定作於教堂焚毀（1835）之前。
- [74] 見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頁 96—97。
- [75] “神父”葡語為 Padre，華人音譯，稱之為“巴的梨”。此處“巴”即“巴的梨”省稱。
- [76] 湯顯祖著，魯文忠注釋，錢新華評析《牡丹亭》，《中國歷代戲曲名著薈萃》下冊，頁 974，長江文藝出版社，1998 年。
- [77] 同注 58，頁 75。
- [78] 同注 58，頁 76。
- [79] 同注 58，頁 79。
- [80] 同注 58，頁 162。
- [81] 同注 58，頁 52。
- [82] 同注 64，頁 38。
- [83] 同注 58，頁 261。
- [84] 方以智《物理小識》卷十二，頁 293，王雲五主編《萬有文庫》第二集，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六年（1937）。

- [85] 梁學昌《庭立記聞》卷二，頁 18，嘉慶刻清白土集本。
- [86] 同注 17，頁 173—177。
- [87] 葬於聖保祿教堂者名錄參見 Manuel Teixeira, *The Church of St. Paul in Macau*, pp. 95—110.
- [88] 關於澳門廟宇，參見陳煒恆《澳門廟宇叢考》（兩卷），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2009 年。

## Space and Psychology: A New Study on the Jesuit Church of St. Paul in Macao

DONG Shao-xin

### Abstract

The Jesuit Church of St. Paul is the most important architecture of western style in Macao. Since late 19<sup>th</sup> century, there have been many articles and books by western scholars discussing its style, structur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and religious meanings of the embossments on its façade. Based on these previous researches, this article tries to discuss its location, space, social roles, and the attitude and impression of Chinese people to it.